

讲好老区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运城日报 合办

本版组稿:本报记者 苏黎原
见习记者 曹欣怡

一把手枪起家战果累累 多次战胜敌伪威震河东

抗日游击队十支队创建人杨德山

杨德山(1918—1945),夏县庙前镇史家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组建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并担任支队长,1945年10月病逝,年仅27岁。

1941年至1945年,在夏县、安邑、平陆一带,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铲除汉奸,消灭日匪,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这支抗日游击队就是由夏县三区牺盟会秘书杨德山和区委书记刘邦杰等人创建的中条山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也称杨德山支队。

这支抗日队伍的创建,是靠一把手枪起家的。

1939年10月,夏县郭村党员李水柏在夏县牺盟会时,曾经自掏腰包购买了两把手枪。由于他和杨德山关系较好,又是革命同志,便将其一把手枪赠送给了杨德山。

1941年夏天,中共条西地委作出指示,要求组织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员杨德山、刘邦杰召集三区的张学斌、杨玉田、黄吉元等人,采取“合法斗争,长期隐蔽,灰色面目,短小精悍”的方针,组建起一支抗日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初期,只有七、八

个人,仅有杨德山的一把手枪作为武器,以裴介村作为活动据点,开展秘密活动。

人少枪少,如何开展革命?杨德山带领杨玉田、杨廷贵去中条山腹地的中共条西地委,请求党组织支援。

三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见到了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杨德山开门见山地说道:“抗日游击队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武器,希望地委能够帮助解决。”柴泽民同志笑着说:“咱们一无兵工厂,二无弹药库,三无经费来源。有的只是一本本血泪账,一桩桩民族恨,要把血泪和仇恨化作力量,变为枪弹。我们的兵工厂就设在敌人的大本营。咱们得想方设法向敌人要,如果硬攻不行,就用智取。”尽管这样说,分别前,柴泽民同志还是送给他们一把手短枪、两支长枪,杨德山等人非常高兴。

没过几天,杨德山得到情报,有一辆马车要从运城去夏县运粮,途经裴介。当天一早,杨德山带领游击队队员埋伏在裴介附近的高楼村,准备袭击敌人、截获武器。谁知从早上等到中午,仍然不见敌人踪影。大家饥渴难耐,却又担心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敢撤离。就

在游击队队员焦急之际,不远处传来铃铛的响声,有辆马车从运城方向驶来。马车上搭着围篷,车轱辘上坐着一个赶车的日军,车里躺着一个烫发女人,车后跟着一个骑马的日军,手里还掂着一把盒子枪。

当马车走到游击队队员埋伏的高楼下时,杨德山大喝一声:“不准动,缴枪不杀!”紧接着,一个箭步飞跃上车,把车轱辘上的日军按倒在地,用膝盖死死顶住。杨玉田等人直接向骑马的日军奔去,一个拽脚,一个按手,一个夺枪,配合默契。日军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游击队队员俘获,枪支被缴。就这样,杨德山带领同志们安邑、夏县一带活动,收缴敌人的枪支。

根据形势的发展,游击队积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打击顽固反共分子,消灭了盘踞在前山沿一带的吴吉林土匪武装,赶跑了王凤山。接着,又与太宽河张保文的部队取得联系,与平陆的吴仲六部队建立友军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开展瓦解敌伪的工作,先后从安邑警察局、安邑宪兵队、运城日軍司令部工作队、夏县警察局、夏县警备队、夏县政府民警队,以及阎锡山的“三九部”等队伍中争取了相当

一部分敌伪人员。他们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默契配合,在武装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春节期,日军进行大“扫荡”。此时,游击队早已拿到敌人出发时间、路线及兵力部署的相关情报,顺利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没有受到损失。反“扫荡”胜利后,游击队又攻打堡尔村日伪警备队的一个小队,缴获不少武器。

1942年夏,随着县南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为适应抗日斗争新形势,中共条西地委、夏县县委把杨德山的游击队与刘涛涛的保安队进行整编,共同组成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杨德山任十支队队长,王守义任副支队长,李座敏任参谋长,张学斌任副官处主任,金岩任副主任,卫振职、中永亮任副官。支队下辖5个大队,500余人,300余支枪。一大队主要活动于祁夏公路、太宽河一带;二大队主要活动于史家、前山一带;三大队主要活动于泗交附近;四大队主要以汤里为中心开展活动;五大队主要活动于平陆三区一带。

从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夏县、平陆、安邑一带多次战胜日伪军,战果累累,成为威震河东、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力量。

把杂货铺建成地下交通站

条西地委挺进第五支队长薛勤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平陆县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人物之一。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平陆县城和张村、张店等重要村镇,建立法西斯统治。

1939年,阎锡山发动了以反共为目的“十二月事变”。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党的各级组织或转移,或转入地下。

为了坚持斗争,平陆县委决定在县城组建党的地下交通站(又叫联络站),任命薛勤为站长,解文奎为副站长。根据县委指示,党的地下交通站建在老县城里,公开名称是“协盛亨”杂货铺。薛勤、解文奎二人千方百计为交通站捐钱捐物,置办桌柜、货架、凳椅,采买商品,积极开展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在交通站的掩护下,薛勤多次接送党的干部,传递党的指示和情报,筹集枪支、弹药和经费,为抗日武装输送干部和战士,为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1年初,薛勤受县委委派,离开交通站,化名项奎,到阎锡山平陆保安支队工作。他先后担任该支队二大队的副队长、大队长、副支队长、支队长等职。

一个为掩护左权将军牺牲

左权将军的警卫员张耀华及胞弟

图消灭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日军炮火的轮番轰炸下,我军阵地变成一片焦土。

当时,左权将军负责断后,掩护八路军总部以三路突围。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把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罗瑞卿主任护送出去后,又返回阵地,请求左权将军撤离。左权将军说:“等大家都转移出去,我才能走。”于是,唐万成命令张耀华保护好左将军,便继续投入战斗。敌机炮火猛烈,在炮弹射向左权将军时,张耀华奋不顾身冲过去,趴在首长身上,掩护左权将军,不幸与左权将军同时壮烈牺牲。

左权将军是我党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抗战阵亡级别最高将领,牺牲时年仅37岁。左权将军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为此,朱德总司令写了这样一首诗悼念左权将军:“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浊水花。”当时与左权将军同时牺牲的,还有新华社报社社长何云、中共中央北方局

在中条山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2年,薛勤任中共条西地委挺进第五支队长。同年7月,他与吴仲六分别率领五支队和四支队并肩作战,消灭了一个由窑巴山据点来啃岚一带骚扰的日军小队(9人)。日军为了报复,集中大批日伪军对啃岚一带进行“扫荡”。

此时,薛勤的爱人为逃避日伪汉奸的抓捕,到啃岚寻找丈夫。为了不连累群众,薛勤将妻子安排在荒野深沟。

不久后,薛勤的爱人生下一个女孩。他忙于革命无暇照顾。为了让孩子躲过搜查,在女儿还未来得及见到父亲一面的情况下,妻子万般不舍地让附近村的一个老妈妈抱走女儿认作养女。

薛勤回到部队后,按照地委指示,将平陆县令狐兴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编入五支队,列为六中队。部队经过休整,一大队由大队长刘永祥率领赴夏县、闻喜开辟抗日根据地。薛勤协助二大队队长李岗,率领二大队四中队、五中队,重返条西创建抗日根据地。

途经平陆红咀山时,他们与日军相遇,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二大队队长李岗、五中队队长王

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捐躯

左权将军的警卫员张耀华及胞弟

领导张衡宇等。

随后,在为张耀华颁发烈士证时,因找不到家人,他的烈士证一直由部队一位姓余的首长保管。后来,余首长调去北京,但仍没有忘记寻找张耀华的家人。

1945年日军投降后,晋西南工委书记廉怀德来到翟家庄,住在张耀华家的窑洞里。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建新绛地方武装。廉怀德先后在这里组建了游击一大队、游击二大队、县大队、独立队、二中队,以及三、四区区干队等武装。廉怀德的妻子也住在翟家庄,她经常和当地妇女种花织布,下地种庄稼。她说:“现在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生活困难。”

廉怀德同志平易近人,闲暇时就教张耀华的弟弟张全有吹军号、打枪,还给他讲述战斗故事。在廉怀德的影响下,张全有成长为翟家庄村民兵队的一名通讯员。

1953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第六十军一八一师五三八团

存才、支队长警卫员李明朗和数十位战士壮烈牺牲,薛勤也身负重伤。

部队撤出战斗后,奉命到平陆马泉沟休整。平陆县委又将三区40多人的支抗日游击队交给薛勤,编入五支队。五支队二大队规模进一步扩大,下辖四、五、六三个中队。

1943年2月,薛勤奉命率领二大队到稷王山执行任务。行至夏县裴介镇时,与日军大部队相遇。激战中,六中队由南突出重围;四、五中队向西南突围,伤亡惨重。薛勤率领10余人突围至安邑县仁村时,被该村伪自卫团包围,薛勤被捕,当天便被敌人移交给日军,关押在运城监狱。

薛勤被俘后,条西地委、十支队的领导人曾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但最终未能如愿。

日军及其情报机关妄图从薛勤口中得到有效情报。但是,面对敌人的利诱和毒刑,薛勤不屈不挠,痛斥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得不到任何情报的情况下,日军恼羞成怒,先将薛勤的牙齿打掉,又将他的舌头割掉,残忍地将其杀害,最后将其尸体扔到安邑的一口井内。

解文奎(1916—1942),平陆县张村镇三湾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7年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任平陆抗日游击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五连指导员和中共支部书记。1940年冬创办平陆党的地下交通站,任站长。1942年因汉奸告密被日军抓捕,牺牲时年仅26岁。

解文奎出身富裕家庭,家境殷实。9岁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其母杨玲玲拉扯三个儿女长大。那时,解文奎家周围的土匪、恶棍,把他家看作一块“肥肉”,不时抢劫骚扰。同族本家还以族长、村长的特权,千方百计陷害他们孤儿寡母,妄图侵吞他家的财产。

1930年,解文奎考入平陆县立第一高小。第二年冬,他参加学校师生发动的抵制日货和反对贪官污吏的爱国群众运动。在运动中,他目睹县长、公安局局长被赶下台的情景,明白了读书的目的不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是国家富强、解放劳苦大众。

解文奎学习兴趣广泛,尤其喜爱阅读书报杂志、讨论时事政治。1933年,李绍伯等人在县城举办青年读书会,号召有志青年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以振兴中华民族。解文奎深受启发,积极到读书会借阅革命书籍,并和读书会会员讨论救国救民的问题。

1936年,解文奎在陕县九中毕业,得知西安是抗日救国的革命圣地,便奔赴西安读书“取经”。在西安读书期间,他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故事,见到许多进步人士,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他还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同年冬季,解文奎在西安购买了一批革命书籍带回家乡平陆。他仿照青年读书会的办法,在自己家中收拾了一间屋子,用来陈列这些革命书籍,并号召青年读书,研究救国救民的道理。他的爱人负华(又名负宝英,解放后曾任国家物资局人事处处长)、胞弟解文焕(烈士)、内侄负学增(烈士)等优秀青年,就是在这里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

解文奎从西安回到平陆后,与地方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接上了关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初,他由省里派来的村政协助理高功淑介绍加入牺盟会,根据牺盟会的安排和刘翻身(烈士)、薛经伦等人一起筹建平陆县知识青年战地服务团,并被选为七名常委之一。

知识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三项任务:一是组建抗战图书馆,传播革命真理;二是成立抗战话剧团,编演抗日剧目;三是协助牺盟会筹建抗日游击队。解文奎分管抗日话剧团工作。为了办好剧团,他说服母亲和爱人,为话剧团捐了一百多元(大洋)日夜衣服数十件。在剧团,他既编剧本又当导演,有时还充当演员,日夜忙碌。

一次,剧团到其岳父所在的南吴村下乡演出。解文奎的岳父是该村的富户,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其岳父觉得女婿上台演戏不光彩,拒不看戏,对解文奎也不理睬。在爱人负华的帮助下,解文奎登门向岳父一家宣传革命道理。经过一番宣讲,其岳父与家人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支持解文奎的抗日救国行动,还为东北流亡同胞捐了钱款和衣物,家里的年轻人也都纷纷走上社会,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为了便于工作,解文奎发展负华加入民先组织,后又介绍负华加入中国共产党。负华入党后就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为丈夫保管文件、接应来往同志。在他们开会时站岗放哨、为东北流亡同胞捐款捐物……解文奎担任平陆抗日游击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后,为支持部队和儿子战胜困难,其母亲杨玲玲捐献粮食一百石,并将自己的家作为伤员护理所和军械仓库,帮助部队护理伤员,保管缴获来的小炮两门、步枪五十支。同时,她还支持儿媳负华赴抗大晋东南分校学习,被战士们誉为“革命妈妈”。1940年3月,日军再次“扫荡”平陆县,“革命妈妈”杨玲玲不幸被日军杀害。

1938年3月,平陆县抗日民主政府对全县3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整顿,统编为平陆县抗日游击支队。解文奎任五大队政治指导员。他和大队长祁振汉率部先后在龙门关、县城以至解县、芮城等地袭击日军,并取得多次胜利。1938年7月,平陆抗日游击支队编入山西政卫三支队,解文奎任二大队五中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同年12月,政卫三支队升编为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解文奎任五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营党委委员。

1940年冬季,县委决定由解文奎协助薛勤在县城创办党的地下交通站。为解决办站经费问题,解文奎又一次捐款300元(大洋)。1941年,交通站领导人薛勤调到部队后,解文奎负责交通站工作。

1942年春,后湾村村长、日伪情报员侯某,凭借职权多次找借口向解文奎“借”钱。有一次,侯某要借100元(大洋),文奎只借给他80元(大洋),侯某便怀恨在心,向日军报告:“解文奎是八路军指导员,是共产党在平陆的密探。”日军趁解文奎赴圣人涧获取情报时抓捕了他。

解文奎被捕后,日军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平陆地下组织的情况,用各种手段引诱并施以残暴酷刑,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解文奎还在狱中组织难友开展积极斗争。1942年4月,他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遍体鳞伤宁死不屈 保护战友舍生取义 面对屠刀视死如归的郭怀亮

郭怀亮(1922—1944),绛县人,绛县抗日独立营排级干部。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44年夏季,在绛县孙王村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被俘,面对日寇屠刀,坚贞顽强,誓死不屈,捐躯效国,牺牲时年仅22岁。

1944年夏季,郭怀亮和战友们在绛县孙王村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但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敌人把他押到当时被群众称为“阎王殿”的董封村进行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你们的领导是谁?”一个日本军官通过翻译恶狠狠地问。

“不知道。”郭怀亮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敌人仍不死心。

“不知道。”郭怀亮斩钉截铁地回答。

敌军气急败坏,拿着铁棍、劈柴刀,毒打郭怀亮。郭怀亮身上的单衣被撕成碎条,全身血肉模糊,昏了过去。敌人又用凉水将其泼醒,但始终没有从他嘴里撬出一个有用的字。

硬的不行,敌军又开始用金钱利诱郭怀亮,并把钢笔和纸递到郭怀亮面前。郭怀亮严词拒绝,表示:“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郭怀亮要把满腔怒火写到纸上。日军见他开始写了,露出狰狞的笑容。郭怀亮趁给军官递纸的时机,把钢笔戳进了他的眼睛。

军官恼羞成怒,一刀砍掉郭怀亮的一只耳朵,顿时血流如注。另外几个日军又拿起烧红的铁条朝郭怀亮身上烫,顿时响起“吱啦啦”的声音,出现了一块块的烙伤,惨不忍睹。

见郭怀亮怎么也不招供,彻底失望的敌人准备杀害郭怀亮。敌军架着遍体鳞伤、无法行动的郭怀亮向刑场走去。刚刚走到董封村大庙,郭怀亮突然发现在人群中干“苦力”的战友,一下子怔住了,睁大了眼睛。敌军立即举枪朝着他注目的方向,连声追问:“这里有你的朋友?是谁?说出来,你可以不死!”

郭怀亮后悔自己的大意。他清楚,此时此刻,若自己再看一眼战友就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想到这些,他马上闭上眼睛,连连摇头,把与战友重逢的喜悦和与战友绝别的悲伤,以及自己组织的千言万语一起压到内心深处。他眉宇间带着得知自己的战友仍在战斗的喜悦,迎着敌人的屠刀挺了上去。

成立抗日话剧团 创办地下交通站

平陆抗日游击队五大队政治指导员解文奎